

元稹在通州的诗歌理论及创作

屈小玲

元稹是中唐时期与白居易齐名的诗人。元和五年他由监察御史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十年再出为通州（今四川省达县市）司马，直至元和十三年冬，在通州共约四年光景。时间虽不太长，但在他一生的诗歌创作活动中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既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丰收时期，共作诗一百八十余首（加佚诗），约为现存全部诗作的五分之一左右；又是他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确立和发展时期。

元稹在通州时期提出了自己对于诗歌创作的理论主张，从而确立了他在新乐府运动中的重要地位。白居易在《答元九书》中明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主张诗歌创作要有“美刺”“比兴”、“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要“救济人病，补察时阙”，反对六朝以来那些“嘲风雪，弄花草”内容空虚贫乏而又缺少“美刺”“兴寄”的作品。白居易的主张成了中唐新乐府运动闪烁着现实主义光辉的诗歌理论，他的诗歌理论实际上与元稹在通州时期的诗歌主张有直接的联系。元稹在通州所写的《叙诗寄乐天书》、《乐府古题序》和在这之前不久所写的《新题乐府序》中，已提出了关于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

一、“寓意”“讽兴”，“刺美见事”（《乐府古题序》）。元稹认为诗歌

应有兴寄，要反映现实生活，起到美善刺恶，讽谏社会的作用。他说：“《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谓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他认为从《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就是“讽兴当时之事”，这是应该发扬的；那些“沿袭”“重复”的模拟之作，“于义咸谓赘剩”，应加以反对；主张诗歌要有“寓意”，要“刺美”，要有讽谏的意义。因而他特别推崇杜甫，极力倡导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在叙述自己诗歌创作的经验时说：“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兴寄，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他认为杜甫的诗歌内容丰富，形式完备，有寓意，有寄托，有讽兴，反映了社会的现实。他批评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间的诗歌缺乏比兴寄托，内容贫乏空虚。他虽然推崇唐诗革新的先驱者陈子昂的《感遇诗》，“吟玩激烈”，进行了仿作，但他认为陈子昂未来得及完备，不如杜甫的“处处臻到”。（《叙诗寄乐天书》）这里元稹不仅总结了初唐到盛唐以来诗歌发展的历史过程，正确评价了前辈诗人的功过，而且响亮地提出了诗歌创作应“寓意”“讽兴”“刺美”的新要求，继承并发展了由陈子昂发端，经杜甫进一步完善的唐

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

二、“雅有所谓，不虛为文”（《新题乐府序》）。元稹在贬谪江陵和通州之前就已经提出了这一主张，认为咏物写怀，抒情写志，都要反映自己的真情实感，不要矫情虚饰。到通州后，他在《叙诗寄乐天书》中对这一主张进一步加以完善和补充，使之具体化了。他说：“每公私感愤，道义激扬，朋友切磨，古今成败，日月迁逝，光景惨舒，山川胜势，风云景色，当花对酒，药罢哀余，通滞屈伸，悲欢合散，至于疾恙躬身，悼怀惜逝，凡所对遇异于常者，则欲赋诗。”他认为他自己所写的诗都不是无病呻吟之作，而是客观事物激发他创作欲望的结果，都是他真情实感的流露。他还说，由于他自身“不幸，年三十二时有罪谴弃。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间，是丈夫心力壮时，常在闲处无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怀，又复懒于他欲。全盛之气，注射语言，杂糅精粗，遂成多大，然亦未尝缮写。”由于他贬谪通州期间正是强壮之年，却常闲居无用，其性情又不合于老庄之道，不能忘怀时事，又无其他爱好，故凭着自己锐意上进的盛气，就只好把这种思想感情用语言表现出来，用诗歌来排遣自己的苦闷，因即“杂糅精粗”创作了不少篇幅较大的作品，只是未来得及缮写编辑而已。这既是元稹在通州期间所以能写出许多大型组诗（如《虫象诗》《乐府古题》等）和长篇诗作（如《连昌宫词》）的缘故，同时也说明了这些诗歌正是他内心感情的发泄和生活遭遇的实感，而并非随心所欲的吟咏之作，这就是“不虛为文”的理论主张的最好注解和说明了。

三、“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乐府古题序》）元稹主张用新题写时事，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直接抒写时事政

治，而不应依傍古人，模拟古人。他极力推崇杜甫即事名篇，真实反映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那些新乐府诗。他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他认为杜甫的这一创作经验值得继承、发扬和推广。正因为如此，所以当他看到刘猛、李余赋古乐府诗数十首时，便称赞他们“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并立即“选而和之”。以身作则，加以实践和提倡。“咸用新意”就是“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即以古题写新事，或自拟题目，直写现实的“无复依傍”之作。元稹“选而知之”，这说明他受刘、李二人的启发并在二人的基础上既有所继承，更有所独创了。后来他的诗歌创作不断地从杜甫和同时代许多诗人的诗作中吸取营养，也正是这一理论主张的具体体现。

元稹在通州时期关于诗歌创作的这些理论主张，奠定了新乐府诗歌运动的理论基石。他的理论主张得到了白居易的重视和支持，通过白居易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形成了新乐府诗歌运动的理论。贺裳《载酒园诗话》说：“元、白诗不能高，论诗却高，微之《少陵墓志》《叙诗寄乐天书》，乐天《寄元九书》，皆深得六艺之解者。”这样的评价是很有见地的。元稹在通州时期与白居易共同确立了中唐新乐府运动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他对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元稹在自己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指导下，在通州司马任内，或与友人唱和，或因感慨系之，或写时事政治，或描风土人情，产生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强烈的讽谏之作，从而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主张。

首先，元稹在通州写下了十九首“饱闻政失，熟视民病”的《乐府古题》诗，对劳动人民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对统治者表示了愤恨不满和斥责揭露。这些诗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征夫、田家、织妇、商人、佚客、宫女、乐伎、文士等无一不入诗，深刻而又集中地反映了唐代中叶的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其中如《田家词》、《织妇词》等都是深刻而又流传较广的作品。请看《田家词》：

牛羸吒，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
种得官仓珠颗谷，六十年來兵簇簇。
月月食粮车辘辘，一日言军收海服。
驱牛驾车食牛肉，归来收得牛两角。
重铸楼犁作斤劓，姑舂妇担去输官。
输官不足归卖屋，愿官早胜饑早复。
农死有儿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

这首诗控诉了统治者长年用兵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揭露了官军不过是一群打着收复旗号祸害百姓的豺狼，讽刺他们不能胜敌只能害民的罪行。字里行间寄寓着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统治者横征暴敛的指斥。特别是最后几句，深沉凝重，正话反说，于平静中含讽刺，更显示出诗人对统治者的不满和愤怨之情。如果说《田家词》是劳动农民的呼喊和抗争，那么《织妇词》则是劳动人民的血泪控诉。“今年丝税抽征早”“主将勋高换罗幕”，诗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由于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征求无度，才使得“织妇何太忙，蚕经三卧行欲老”，终年劳累，织作不息。尽管她们“缥丝织帛犹努力，变缉撩机苦难织”，然而她们的命运却是十分不幸，异常悲惨的：“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予掾荆时，目击贡綾户有终老不嫁之女）”为了织锦贡綾，一些织女竟至于终生不嫁，荒废了青春。“羨它虫豸解缘天，能向虚空织罗网”。织妇

感叹自己不如空中结网尚能自由自在的虫鸟，实在是血与泪的控诉了。这首诗与杜甫《夔州行》“夔州处女发半华，四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元稹努力学习杜甫诗歌创作所取得的成就。此外如《古筑城曲》五首、《夫远征》《采珠行》等揭露统治阶级徭役的繁重；《董逃行》《冬白紵》揭露统治阶级残害人民的罪行和骄奢淫逸的生活；《估客乐》反映当时商人的剥削，讽刺其唯利是图的本性。这些作品都是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寓意兴寄之作。

其次，元稹在通州还写了不少政治讽刺诗。在这类诗中有直接表明自己政治主张，讽谏当时社会现实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唐王朝由盛而衰，江河日下。元和十二年宪宗任裴度为相，终于将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平定了，唐王朝一度呈现出“中兴”的气象。这时被贬通州的元稹一方面为此高兴，另一方面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唐王朝的社会危机并没解除。因而他在这首长篇叙事诗中通过宫边老人之口来规讽当时时政，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作者通过连昌宫昔日繁华兴盛和今日衰败萧条的盛衰变化这一侧面，形象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唐王朝日趋没落的社会现实。诗人又追根溯源，揭示了“太平谁致乱者谁”，造成这一祸乱的直接原因：“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开元之治的盛世是由于玄宗任贤用能，励精图治，“开元之末姚宋死，朝中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庙谖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痍。”

安史之乱的爆发完全是因为玄宗后期任用佞倖权贵，荒淫腐朽所致。这就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而又难能可贵的。最后，诗人鲜明地表示了希望削平藩镇，反对分裂，主张统一的进步思想。“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明确地提出了要求停止用兵，用政治来消灭内乱的政见。这显示了诗人对时局的关心及清醒的政治头脑。宋代曾巩曾说：“《津阳门诗》（郑隅作）《长恨歌》《连昌宫词》，俱载开元、天宝间事。微之之词不独富艳，至‘长官清明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委任责成，治之所兴也。‘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险波私谒，无所不至，安得不乱？稹之叙事，远过二子。”（《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三）这三首诗各有妙绝之处，褒贬抑扬，不宜有偏。但就揭示安史乱因这一点来讲，曾巩所评还是正确的。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因这首诗“既有指斥，似不可选”却不录此诗，正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元稹此诗强烈的现实意义和讽谏作用。

在通州时期元稹另有一些诗却是借物为讽，以奔放愤激之词抒写自己内心深处的不平之感，以间接的方式对政治进行了讽刺。如《虫豸诗七首》。诗人在序中指出自然界各种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各自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如果“人不得其宜，而之鸟兽虫鱼之所宜，非虫鱼兽鸟之罪也”，“因赋其七虫为二十一章”“以备琐细之形状，而尽药石之所宜，庶亦叔敖之意焉。”这一方面是对自己“人不得其宜，而之鸟兽虫鱼之所宜”的贬谪生活的牢骚怨愤。但同时也明白地表示了自己是通过对各种毒虫“琐细之形状”的刻划，来达到要以“药石”治人，进而如“孙叔敖之意”要以之治世的目的。诗人极力描写这些自然界的毒虫为害之烈：巴蛇“掉

舌翻红焰，盘身蹙白花。喷人竖毛发，饮浪沸泥沙”；蝮蜂“微遭断手足，厚毒破心胸”；蜘蛛“那知缘暗隙，忽被啣柔肌，毒腴攻犹易，焚心瘳恐迟”；蚊子“攻穿漏江海，嚼食困蛟鲸”；蝮子“毫端生羽翼，针喙嚼肌肤，暗毒应难免，羸形日渐枯”；浮尘子“有毒能成瘡”；蠹“众噬锥刀毒”。但最后诗人都归结到人世：“安知人世里，不有噬人人”，“已微于蠹蠹，仍害及仁人”，认为这些毒虫的害人就仿佛人世间权倖小人害及仁人正士一样的残酷凶狠，狡猾毒辣。他进一步指出：“敢惮襮柶蠹，深藏柱石倾”，这种权倖小人将会危害国家柱石，危害国家安全。“欲学叔敖逯，其如多似麻”，他本欲学习孙叔敖将这些毒虫埋掉，为民除害，但无奈毒虫太多，所以只好“寄言持重者，微物莫全轻”，要当政者引起警惕，不要轻视了这些害人之物。不难看出，托物寓讽，指斥现实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

第三，酬和唱答，抒写友情，这是元稹通州诗作的又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诗人与好友白居易的唱和诗更是深情绵邈，为人传诵。元稹贬谪通州不久，白居易即贬江州，“虽江、遥悬邈，而二人来往赠答，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者。江南人世，传道讽诵，流闻天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惋。”（《旧唐书·元稹传》）这些唱和诗真实地反映元白二人在政治上共同的不幸遭遇和彼此同情；在生活上的互相关心与帮助；在创作上的一致见解和切磋商讨，字字句句凝聚着他们两人之间的深情厚谊。当元稹“一身骑马向通州”（《津西别乐天博载樊宗宪李景信两秀才任谷三月三十日相饯送》），打算“千万人间事，从兹不复言”（《归田诗》），心情沮丧，徬徨抑郁之时，白居易亲送其至郾县蒲田

村，赋诗相赠，深表同情。同样当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时，元稹在大病垂危中乍闻此事，也震惊不已，写下了有名的《闻乐天授九江司马》诗：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滴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昏暗的残灯摇曳不定，大病中寂寞愁苦的诗人突然听到好友遭贬的恶耗，骤然惊起，浑身的寒意，满腹的忧虑……寥寥四句，同情、惋惜、悲痛、愤恨全倾诉了出来，十分感人。难怪白居易在江州读到这首诗后感慨地说：“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惻惻耳”（《与元微之书》）。

政治上的共同遭遇更加深了两人的友情，他们虽相隔千山万水，但却总是互相体贴关心。通州气候恶劣，自然条件很差，元稹由于水土不合“至通州，染瘴严重”（《酬东南行》注）。白居易得知此事，立即从京城长安给元稹寄去了穿著轻便的毅衫和纱袴，后来又从江州寄去祛热避暑的蕲州竹席。对此元稹十分感激。在病中更是常常思念远在江州的白居易，

“万里寄书将出峡，却凭巫峡寄江州”（《凭李忠州寄书乐天》）除托友人常捎书寄信问候白居易外，他也常盼着白居易的来信，一旦接到白居易的书信，他便欣喜若狂，泪交流：

远信入门先有泪，妻警女哭问何如。

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

——《寄乐天》

在通州疾病折磨的日子里，病痛、寂寞、无聊，使得元稹思念白居易甚至到了食不下咽的地步：

人亦有相爱，我尔殊众人，朝朝宁不食，日日愿见君。一日不得见，愁肠坐氛氲。

——《酬乐天赴江州见寄》

由此可见元白二人确实是“以诗相诚”，“以诗相慰”，“以诗相娱”（白居易

《与元九书》）的，这些唱和酬答，“绝非广泛交际率尔酬和所为”（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而是两位诗人内心痛苦的抒发，共同友谊的结晶，故感情真挚，情调凄惋，“传遍讽诵”“里巷相传”，颇能赢得士民的共鸣。

元稹任通州司马时间并不太长，但却能够明白提出自己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主张，写出数量不少的具有现实意义的诗歌，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他生活的中唐时代以及他个人的身世经历，政治遭遇分不开的。

元稹生活的中唐时代，藩镇割据于外，宦官专权于内，朋党之争不断，局势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激烈，社会陷入严重的无法摆脱的危机之中，盛唐时期那种积极的浪漫主义热情和理想不复存在了。诗人们面对严峻冷酷的社会现实，不得不进行冷静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作出新的理解和回答，于是代之而起的便是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产生和反映社会现实的创作道路的开辟。元稹便是这众多诗人中杰出的一个。

元稹出生于父老、母少，受异母兄歧视的破落的官僚家庭。自幼接触社会下层，对劳苦人民的生活有较深的体察，因而一当他进入仕途以后，便“遇事辄举”正直耿介，言事峭直，与权臣佞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虽然使他遭到了当权者的嫉恨而被解职，但仍坚持不屈。他乘出使的机会，了解民众疾苦，访察不法官吏，先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敲剥百姓的罪行；后惩处了河南尹房式的不法行为；又与宦官争道，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种“擘肘回头项难转，人人共恶难回跋”（《望云骓马歌》）“遇事风生”的斗争精神引起了宦官、权贵、佞倖的不满和反对，因而“不容于朝”，先贬江陵，再贬出为通州司马。这种政治上的失意和挫

折，既使他得到了时人的赞扬和同情，更使他认识到了仕途的艰辛和朝政的黑暗腐朽。他在这个时期所产生的《新乐府》诗并序，可以说正是其斗争生活的艺术体现。

元稹贬谪通州以后，对通州地方的风土民情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了解。“通之地，丛秽卑褊，蒸瘴阴郁，饑为虫蛇，备有辛螫”（《蟲豸诗七首序》），气候恶劣，蛇虫为害。然而更为严重的却是“夺富挠豪，轧穷役疾，弱者遭播，悍者愤拂，饥馑因仍，盗贼仓卒”，由于官吏的侵夺和自然灾害的严重，百姓逃亡，使得“间落焚燔，人民遂空，万不存一”，田野荒芜，民不聊生，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对这种“功不胜农，虚不胜实”的状况，元稹深感忧虑，对人民的痛苦生活深表同情，因此当“元和十三年九月元稹以司马权知州务”（《报三阳神文》）接任通州刺史职权时，“乃劝州人，大课芟莠”，发动并号召当地百姓砍林开荒，发展农业生产，为减轻当地百姓的负担，增加国家收入做了一些扎扎实实的有益的工作。“今天子斩三叛之明年，通民毕赋，用其闲余，夹津而南，开山三十里，为来年农种张本，自十月季旬，周甲癸而功半就。”（《告畚竹山神文》）

虽不无夸张自诩之语，但元稹曾在通州组织当地百姓发展生产却是无疑的事实。故“通州以元稹闻名”（清《达县志》），这是不无道理的。正由于元稹的谪居生活，正由于他对下情的了解和体察，才使得元稹在通州时期写下了《古题乐府》组诗及序，《连昌宫词》以及《虫豸诗》组诗等，而这些诗作及理论都是元稹整个作品中现实意义最强的，也是他整个作品中的精华部分。

综上所述，元稹贬谪通州时期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政治上的不幸遭遇，通州之地的恶劣环境和人民的痛苦生活，不仅给元稹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题材，而且为他的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的基础和充分的条件。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它既折磨了诗人，同时也成就了诗人。

当然，作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的一员，元稹同其它许多诗人一样，在通州时期也有过颓废情绪和消极思想，这在他这一时期的诗作中同样反映了出来，不过，这与他在同时期中的现实主义诗论和创作实践相比较，毕竟是次要的而不是主要的。我们今天指出这一点并引起注意是应当的，但却不应当以此苛求于他。

（上接48页）

总之，《学记》一书，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教育心理学的思想。笔者探其新，并非溢其美，它是一本瑕瑜互见而又瑕不足掩瑜的书。它本身虽然存在着所谓“古之学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和“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等等的问题，那是历史的原因，说阶级局限也可以。然而，研究受教育者在教育影响下形成道德

品质，掌握知识技能，发展整个智慧和个性心理规律，研究教育同受教育者的心理发展的相互关系以提高效率，这是不分阶级不论古今都是同此一理的。《学记》正是在这些主要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可以称之为珍贵的遗产，我们需要尽力挖掘的也正是这些。